

语言论坛

说语话文

穿越古今的魅力

——石鼓文与古代文史研究

□ 黄修志

石鼓被称为“中国第一古物”，自唐初出土迄今，后人对其的痴迷和争论从未停止，几乎历代皆有石鼓诗歌和石鼓研究，这本身就足以勾画出一部诗歌史和学术史。石鼓之所以拥有穿越古今的魅力，关键在于其外在的花岗岩材质和鼓形特征，而是十面石鼓辗转迁移的传奇遭遇和镌刻其上谜一般的石鼓文。

石鼓的辗转迁移

春秋战国之际，秦人刻制十个石碣，史籍中却寂寂无闻。在沉睡千年之后，十个石碣在唐初陕西凤翔府横空出世。因其形状似鼓，故名石鼓，每面石鼓皆刻一篇六七十字的四言诗，共十篇，合《诗经》“什篇”之义，是为石鼓文。“安史之乱”爆发，石鼓一度消失。乱后，石鼓再次出土，为此韩愈上书请求朝廷移入京师大学妥善保管，但未能如愿，直到郑余庆担任凤翔尹后，石鼓才被置于凤翔孔庙。

唐末五代战乱频仍，石鼓在兵燹中不知所踪。宋仁宗时，司马光之父司马池时任凤翔知府，寻得九面石鼓，但失一面“作原”石鼓，经金石学家向传师多方搜访，终于在民间寻到已被削成春梁石臼和磨刀石的“作原”石鼓。酷爱书画金石的宋徽宗即位后，下旨将石鼓移入汴梁大内，又在石鼓阴文上填注黄金以示尊贵。“靖康之乱”，金兵掳运石鼓至燕京，但剔去黄金后便抛入京郊荒野中。

蒙元混一天下，虞集在淤泥草地再次发现石鼓，陈列于北京国子监并置铁栏保护，从此平安度过元、明、清三代。明清时代对石鼓尤为重视：明人《帝京景物略》开卷第一篇即为《大学石鼓》；朝鲜赴京使臣在“燕行录”文献中常常记载观赏国子监石

鼓的经历；乾隆帝为防损坏丢失，移石鼓入皇宫，仿制十面石鼓立于国子监代替。

抗战爆发，为防石鼓落入日军之手，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装运石鼓随故宫国宝南迁至四川，抗战胜利后又东迁至南京，解放战争时，蒋氏欲迁台湾而不得。1950年，石鼓重回北京故宫博物院。

石鼓见证了中华民族兴亡盛衰的历史，它一方面与历代国运的兴亡亡忽紧密相连，往往是乱世消失而盛世复出，另一方面又与历代国运的迁移路线若合符节，从关中到汴梁再到燕京。

“书家第一法则”

被称为“书家第一法则”的石鼓文，在文字史、书法史、金石学甚至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地位。如果说甲骨文是汉字发展的原点，那么石鼓文就是关键节点。

石鼓文主要记载了秦国君臣率领士兵进行渔猎、修路、植树、祭祀等活动，韩愈、苏轼皆从之。直到南宋郑樵提出“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说后，学界又从何问题转移到秦国何时的问题，近代出现了穆公(马衡)、襄公(郭沫若、张光远)、文公(罗振玉等)、德公(王国维)、献公(唐兰)等说。

随着学术的每转益进和穷则思变，当代学者大多认为不可能考证出一个绝对年代，越来越趋向于一个相对年代和弹性空间。李学勤提出“春秋中晚期”；王辉提出“春秋中晚期”；易越远提出“春秋晚期”；美国学者马几道、陈昭容、裘锡圭说法大致相同，基本同意“春秋战国之间”；徐宝贵提出“春秋时期”。导致诸多学者莫衷一是甚至后来不少非专业学者加入论战的重要原因，在于石鼓文的内容和字体似乎分布于秦国前期和后期。任熹在《石鼓文概述》中表达了这一矛盾和纠结：“以史实考之，前期事多关连，较为可信；以文字证

之，则形体结构，后期为尚。”所以有学者为了调和这一矛盾，提出石鼓文的内容创作和文字刻制时间可能并不一致。

跌宕起伏的研究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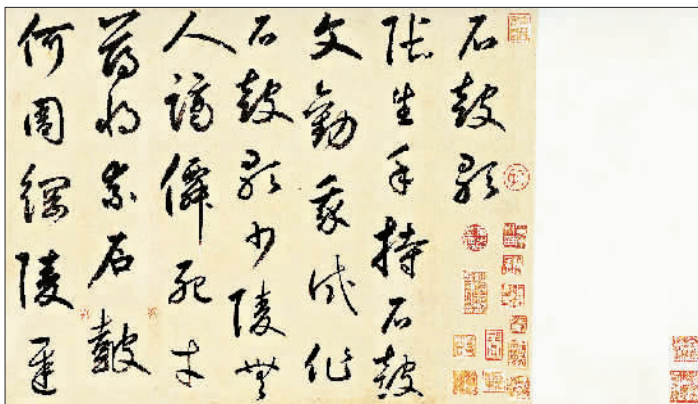
石鼓文面世后一度成为千古之谜，引起后人无尽的研究争论，而聚讼纷纭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年代问题，即石鼓文产生于何时。唐至北宋的学者提出了周宣王、周文王、周成王、北周等说，其中宣王说影响最大。韦应物、韩愈、苏轼皆从之。直到南宋郑樵提出“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说后，学界又从何问题转移到秦国何时的问题，近代出现了穆公(马衡)、襄公(郭沫若、张光远)、文公(罗振玉等)、德公(王国维)、献公(唐兰)等说。

随着学术的每转益进和穷则思变，当代学者大多认为不可能考证出一个绝对年代，越来越趋向于一个相对年代和弹性空间。李学勤提出“春秋中晚期”；王辉提出“春秋中晚期”；易越远提出“春秋晚期”；美国学者马几道、陈昭容、裘锡圭说法大致相同，基本同意“春秋战国之间”；徐宝贵提出“春秋时期”。导致诸多学者莫衷一是甚至后来不少非专业学者加入论战的重要原因，在于石鼓文的内容和字体似乎分布于秦国前期和后期。任熹在《石鼓文概述》中表达了这一矛盾和纠结：“以史实考之，前期事多关连，较为可信；以文字证



北京故宫博物院石鼓展厅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元·鲜于枢书《石鼓歌》(局部)

之，则形体结构，后期为尚。”所以有学者为了调和这一矛盾，提出石鼓文的内容创作和文字刻制时间可能并不一致。

围绕石鼓文展开的学术研究史，与石鼓本身的流传史同样跌宕起伏，其中宋代和近代的研究具有突出意义。

宋代是石鼓文研究的关键时代，成为后世石鼓文研究需要追溯的重要起点。宋代的突破性进展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宋代石鼓诗的学术化，与唐代注重感性审美的苏轼诗相比，宋代梅尧臣、刘敞、苏轼、苏辙、张耒、吕本中、洪适等人的石鼓诗更加注重学术性、哲理性、史鉴性；第二是郑樵首次提出秦国年代说，他首次从文字学角度将石鼓文与秦刻文进行对比印证，奠定了后世考证年代的基本论调；第三是北宋拓本成为石鼓文研究的最佳材料，由于石鼓文在流传过程中多遭损坏，字体亦多有脱落，故而北

宋“先锋”“后劲”“中权”三种拓本成为最可靠的复原本。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能成为近代石鼓文研究的集大成，就是因为他运用了日藏宋拓。

宋代石鼓文研究能取得这些突破，主要归因于宋代整体的文化环境：一是金石学的昌盛，随着商周礼器的不断出土，宋代有足够的实物进行对比研究，消除了三代古器神秘性；二是儒学的理学转型，使学者们走向内在，回归理性认识，宋学出现疑古思潮；三是史学的完备和考证的精深，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纲目体皆于此时并存，史家辈出，学者们更加注重文史考证。而且，宋代金石学、儒学、史学三个圈子之间相互交融，如一代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还是金石学家，不仅撰修了《新唐书》《新五代史》，也撰有现存最早的金石著作《集古录》。

同样，近代石鼓文研究能在

宋、清基础上再进一步，也得益于出土材料和学术风气的转变：一是甲骨、简牍、商周钟鼎的出土提供了新材料，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二是清代朴学考证与西方实证相结合促成了新方法，学界更加重视科学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三是西方文化和理论的传播催生了新观念，学术研究成为一种职业活动，且研究范围不再局限于时代考证，也拓展到其他学科领域。

当今学者对石鼓文的研究已经越来越走向跨学科研究，如从语言学、文字学、书法史、文化人类学等角度进行纵深研究，但在文学史、艺术史研究方面仍显薄弱。另外，有一些问题至今仍是谜团：为何石鼓从先秦到唐初一直未被载录？它被刻成鼓形是否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地处西北的秦国石鼓文表现的礼乐功文化与其域外中西亚的相关文化有无互动或关联？

了解过去的研究状况，有利于明确未来的研究方向。石鼓文的研究史启示我们：新成果和新观点有赖于新材料、新方法、新观念、新技术以及新的文化环境。我们相信，未来随着更多实物文献的出土、研究方法的改进和观念技术的创新，不仅上述谜团会得到破解，石鼓文的绝对年代也有望浮出水面。“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亦是新时代吾侪之责任。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讲师)

以语言文化交流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王辉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应对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连接中国梦和世界梦，实现人类共同美好未来的思想指南。全面协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语言文化交流至关重要。

12月12日至13日，第十二届孔子学院大会召开，主题是“深化合作，创新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据悉，全球已有14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25所孔子学院和1113个孔子课堂，各类学员累计达916万人。10年来，全球孔子学院和课堂累计举办文化活动22万场，受众达1亿人，全球学习和使用汉语的人数超过1亿。语言文化交流在推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语言文化交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世界各国语言文化不同，人文景观多样，价值观念各异。语言文化交流有助于各国及各国民众之间了解彼此的文化差异，尊重不同的文化理念，平等交流，互学互鉴。各国语言文化之间相互碰撞和融合发展可以增强各自文化的包容性和活力，从而形成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世界文化共同体，构筑人类包容和谐的精神家园。

语言文化交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器。语言文化交流能增进国际理解，促进民心相通。各国之间的政治互信、经贸合作、民间交往与语言文化交流密切相关。

语言文化交流具有“五通”作用：通言、通讯、通情、通理、通心。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可能不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式各异，通过语言文化交流，可以引领方向，增进理解，求同存异，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念更坚定，支持更广泛，方式更多样。

语言文化交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纽带。语言文化交流是各国之间的合作纽带，也是各国民众之间的情感纽带。全球化和信息化使人类同处一个地球村。人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有可能了解他国文化，进行跨文化交流。语言文化交流的便利性和超越性使各国在应对经济低迷、恐怖主义、生态恶化等共同挑战时，更有可能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打造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语言文化交流的主体是人，各国民众以语言文化交流为纽带，沟通情感，缔结友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坚实的民意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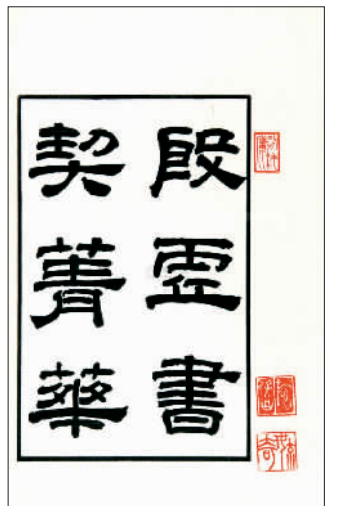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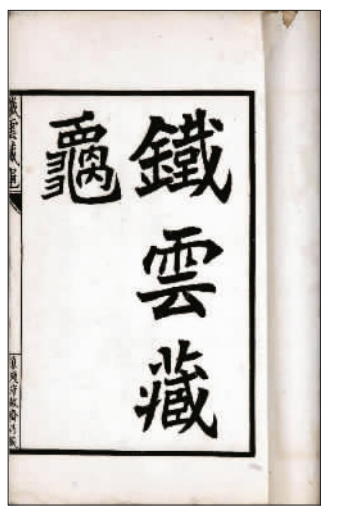
语言文化交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软支撑。加强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依靠经济、技术等硬实力的参与和推动，还需要语言文化软实力的支持。软实力和硬实力相匹配，才能拓展全球治理的深度和广度，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协调发展。语言文化交流是一种重要的公共外交手段，通过语言文化交流的软支撑，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软组织”，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更均衡、更健全。

当前，“一带一路”是中国进行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要深化“一带一路”上的语言文化交流，发挥孔子学院的公共外交功能，提升孔子学院的塑造力和辐射力，创新语言文化交流的体制机制，释放语言文化交流的魅力活力，为新时代构建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教授)

谈甲骨著录书的发展

□ 黄天树



借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机会，笔者介绍三部大型甲骨著录书，因为这是甲骨学者从事研究的基础。

甲骨文作为珍贵的文物，学者很难接触到实物，因而研究甲骨文主要依据甲骨著录书。那么，什么是甲骨著录书呢？甲骨著录书由图版、释文和索引三部分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图版。清晰而完整的图版是研究的基础。甲骨著录的方法有三种，即拓本、摹本和照片。这三种方法各有优劣，可以取长补短。但是大型甲骨著录书为了压缩印刷的成本，主要采用拓本来著录甲骨文。

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903年，刘鹗(字铁云)从自藏的甲骨中选出1058片编成《铁云藏龟》一书出版。这是第一部甲骨文拓本著录书，使甲骨变成了学者可以利用的研究资料，意义很大。1914年，罗振玉出版《殷虚书契菁华》，收录甲骨黑白照片68片。这是第一部甲骨文照片著录书。1917年，加拿大者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出版《殷虚卜辞》(《Oracle Records from the Waste of Yin》)，全书摹写甲骨2369片，这是第一部甲骨文摹本著录书。

《甲骨文合集》

任何学科研究工作的开展，完备的第一手资料是其先决条件。郭沫若早年在日本利用甲骨

文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亲身体会到寻觅甲骨著录书之艰难。因为著录甲骨的书印数少、售价贵，又散见于海内外，不易找全。因此，郭沫若1949年就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后，打算编纂一部集大成的甲骨文著录书，嘉惠士林。

1956年，我国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时，把编纂《甲骨文合集》(简称《合集》)列为国家重大项目，在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由郭沫若任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工作组。工作组从1961年开始编纂，走访国内40个城市，对95个收藏单位和44个私人收藏家的9万多片甲骨进行鉴别、精选和拓印，然后汇集80多年来海内外公私藏家手中的甲骨传世拓本、照片和摹本，进行选片、辨伪、校重、缀合，然后按照董作宾的“五期说”进行分期断代，编成《合集》13大册，于1978至1982年间由中华书局出版。

《合集》第1至第12册是拓本及少量黑白照片，第13册是摹本。而与《合集》图版配套的《甲骨文合集释文》(4册)、《甲骨文合集材料来源表》(3册)一直拖到1999年，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如果从1956年立项算起，到1999年《合集》图版、释文和索引全部出齐，历时40多年才大功告成，可见编纂一部大型甲骨著录书是一项严肃的科研任务，十分艰辛。

作为目前收录甲骨拓本最多的一部大型著录书，《合集》以罗罗版影印，拓本的完整与清晰胜过旧著录书，它的出版大大方便了学者的研究，推动了甲骨学的研究，贡献巨大。

《甲骨文合集补编》

1993年，胡厚宣继任《甲骨文合集补编》(简称《补》)总编辑，不幸的是，他不久因病去世，这一计划被搁置起来。直到1995年，在准备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决定由彭邦炯、谢济、马季凡编纂《补》。《补》沿用《合集》体例，与《合集》拓本配套的《释文》《资料来源索引总表》(全书7册)，于1999年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补》的编者所做主要工作有四：第一，增收《合集》漏收的甲骨；第二，把拓片和摹本替换成拓本；第三，吸收缀合成果；第四，增补“殷墟以外遗址出土甲骨”316片。由于《合集》编纂速度快，其质量不及《合集》。仅以校重来说，《补》编者在“前言”中说：“有时为确定某片是否《合集》已有，就要花去相当长的时间。这种对重、选片的工作，其烦琐、费工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可见编者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但《补》和《合集》相重，《补》自身相重的情况仍然很多。

《合集》收甲骨41956片，《补》收甲骨13766片。这两部大型著录书将有研究价值的甲骨资料汇

集在一起，便利了研究者，极大地推动了甲骨学的研究。

《甲骨文大系》

《合集》《补》是按董作宾五期分法编排的，这一断代体系在甲骨研究的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弊病是把甲骨字体分类和王世的推定混在一起了。今天，学者认识到甲骨断代包括两个方面：甲骨分类和断定每类甲骨的年代。甲骨分类是指根据字体等特征把甲骨划分为若干类；断定年代即确定每类甲骨相当于什么王世。这是甲骨断代研究方法上的重大突破。

笔者于2012年开始主编《甲骨文大系》(简称《甲系》)。全书由“图版(拓本和摹本)”“释文”和“索引”三部分构成，预计73大册，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与《合集》《补》相比，《甲系》有以下特点：一是采用李学勤新的“两期说”代替董作宾旧的“五期说”。简单地说，就是王卜辞并不是一系发展而来的，而是有村北和村南(包括村中)两系。二是为每张拓本制作摹本。三是增补新出版、新缀合的材料。笔者为每片甲骨拓本配备了摹本，翻开《甲系》，映入眼帘的是同一版甲骨，拓本在左页，摹本在右页，对照阅读，十分方便。

甲骨文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古汉语资料。但是，它要作为语料来运用的先决条件便是确定其时代，否则，15万片甲骨依然是一堆“断烂朝报”，缺少应有的科学价值。为此《甲系》作了如下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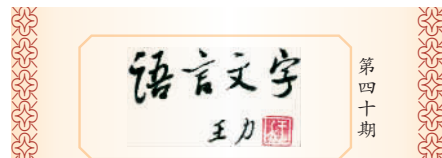
第一，搜集拓本，选择佳拓，剔除伪片，删除重片，缀合残片。殷墟出土甲骨15万片，但已出版的甲骨只有8万多片，《甲系》将

这已出版的8万多片拓本全部收入书中，将是迄今为止所收甲骨拓本和摹本数量最多的一部甲骨著录书。比如，1970年代，《合集》只能翻印台湾的《殷虚文字甲编》《乙编》，拓本多漫漶不清。现在，两岸学术交流频繁，《殷虚文字甲编》《乙编》都有清晰的拓本类，《甲系》将用清晰的拓本替换漫漶不清的拓本。又如，旧著录书为了排版美观，或把没字的部分剪掉，或只推拓有字的部分；《甲系》将用完整的拓本替换那些“被剪掉”和“未拓全”的旧拓本。

第二，字体分类，汇聚同文。《甲系》给每一片甲骨刻辞标注字体类别，这对学术界十分有用。甲骨文主要是占卜记录，其中大部分甲骨的主人是商王，称为“王卜辞”；小部分甲骨的主人是贵族族族，称为“非王卜辞”。殷墟刻辞共有32类字体类别，其中“王卜辞”22类字体，“非王卜辞”10类。此外，仅存孤文只字、字体类组不明的残片则暂归“未详”类中。同一字体类别者，则依内容如祭祀、战争、农业、气象等分类排列。

第三，制作摹本，撰写释文，编制索引。“制作摹本”指用透明纸蒙在拓本上摹写字形及其甲骨形态。“撰写释文”即为每一片甲骨撰写释文。“编制索引”即为每一片甲骨标注属性，如重见情况、缀合情况、拓本清晰完整情况等。近年，甲骨著录书开始电子化。相比纸质甲骨著录书，电子版的甲骨资料数据库有很大优越性，它可以随时补充新资料，调整排列次序。《甲系》除了纸质版外，将来也准备开发电子版甲骨著录书资料库，以方便甲骨学者的研究。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投稿邮箱: gmyy wz@163.com